

疾病的医者难医之处

——《疾病的隐喻》读书笔记

向思琦 历史学系 16307080073

人类的疾病与微生物、与医学密切相关,可当它被放置在人类文化构建的各种语境中时,它又不仅仅是一件“自然科学”上的事了。苏珊·桑塔格的这本《疾病的隐喻》,即从社会文化对疾病赋予的隐喻入手,探讨结核病、癌症、艾滋病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中以什么样的隐喻存在着,这些隐喻又通过什么方式(如文学创作)表现出来,怎样影响着人们对疾病的看法和观念。而这种隐喻,实际上仍是“现代工业的弊病”,它并没有给人类健康带来好处,而是进入道德、美学,甚至政治、种族等范畴,成为各种派别力量实现各自目的的修辞工具,严重影响、干扰着患者正确对待疾病和接受治疗。苏珊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这种“隐喻”,减轻这些疾病的象征意义给患者带来的重压,“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¹**。

本文欲通过简要概括、回顾这本书的内容,思考疾病在社会文化层面被赋予的意义及这种意义如何被利用并影响人类健康,同时对当下现实社会加以反思。

一、 内容概括

本书主要收纳了作者两篇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两篇文章都是以具体、微观的研究来论述疾病在社会文化中的“隐喻”,以及这种隐喻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一部文化批评的经典之作。

《作为疾病的隐喻》主要分析了结核病在十八、十九世纪不同时期“神话意义”的变迁,以及十九世纪以后结核病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分裂、在两种不同的疾病上得以分派——精神错乱病和癌症。结核病在其隐喻的不断变化中,逐渐与“高贵”、“城市”、“柔美”、“诗意”“忧郁”等意义联结在一起,以至于甚至有诗人、少男少女“恨自己没有得结核病”。作者举了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例子以佐证这一点。而癌症与结核病不同,其意义被认为是“压抑激情”、“压抑欲望”,同时“癌”、“溃烂”等常被用来形容腐败、缺陷等。此外,此文也提到了梅毒和精神错乱病的隐喻。

《艾滋病及其隐喻》则指出,癌症的隐喻还未消除,艾滋病作为一种具有双重隐喻的疾病而出现。首先,当说到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时,就让人想到与“梅毒”类似的隐喻——“放荡”、对身体和精力的双重腐蚀等。其次,艾滋病还有相应的军事隐喻和政治隐喻。在桑塔格看来,欧洲、前苏联都存在一种有意为之的强调,突出艾滋病病毒的“非洲起源”说,更情愿把艾滋病看作是来自彼处的“入侵者”²。桑塔格指出:“这是政治偏执狂的语言,典型地透露出其对多元世界的疑惧。”它作为一种政客表达自己意念和实现自己目的的政治修辞,其隐喻地位在不断被提高。

二、 对本书写作的分析与思考

在本书的开头,译者即点出了作者此书的文化意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文化追逐战。尽管二十世纪在政治、社会上资产阶级的民主化革命或改革已经基本取得胜利,但在文化上文化民主制与文化等级制的“战役”却还未取得胜利。为什么“文化的战役”如此难得胜利?一是文化的内化作用有时的确是非常坚固的。二是,译者也在文中指出:“一

¹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² 查日新,汤黎. 浅析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文化解读[J]. 国外理论动态,2009(07):79-83.

且昔日的被压迫集团获得了权力，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时候，当初的乌托邦就与这个集团自身的利益开始发生冲突，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方案。一方面，它仍然试图从当初的乌托邦那儿获得一种来源于历史却已快被耗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了既得利益，它又不得不把曾经被自己驱逐掉的那种意识形态偷偷塞进乌托邦的空壳中。”³以疾病与其隐喻为例，当已成为政治、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时，这一集团并不会选择彻底打破这种隐喻，而是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地继续使其“为我所用”。故苏珊这类指出这种文化批评的人，才被认为是“父辈资产阶级的不肖之子”。

此外，此书着眼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具体疾病的隐喻及其表现形式，是一种典型的**微观视角**。在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转向的学术研究趋势流行的当下，宏大叙事被不断解构，微观视角和微观研究受到追捧。本文从微观来解构、剖析疾病的隐喻，也是这一流行趋势的体现。正如译者所言：“大叙事只是一种世俗神话，是权力压迫集团的政治修辞学（意识形态），也是被压迫集团的政治修辞学（乌托邦）。”而**微观叙事**，才能让我们摆脱统治阶级、权利集团制造的主流话语的建构，使现象更加接近其本质。

脱离以上的抽象话语，从现实关怀的意义来看，此书的文化批评有利于解构疾病被赋予的各种文化隐喻，从而有利于疾病患者正确看待自己的疾病和接受治疗，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改变整个社会正确认识疾病的本质，不再歧视或“崇拜”某种疾病和疾病患者，让“疾病”成为“疾病”本身。**

在第一篇文章的结尾，作者认为，只要疾病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能够被彻底治愈，也许就不会再被附加各种各样的隐喻了。然而，作者在最后也悲观地指出，疾病“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而“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⁴。

换句话说，疾病的被治愈远比解决它的隐喻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要简单得多。**我们要消除的不仅是“疾病的隐喻”，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这些“隐喻”换一个载体，而是要去解决这些隐喻背后藏着的真正的问题——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生命的焦虑。**

三、对当下现实的关照与反思

苏珊·桑塔格的写作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反思，**疾病被治愈的过程中哪些障碍是医者可医的，哪些障碍是需要社会中每个人的努力才能改变的。**

当下癌症、艾滋病仍然被赋予各种隐喻，这种情况直接的后果就是“谈癌色变”，而艾滋病患者因为遭受歧视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2015年一名艾滋患者因“平等就医权受到侵害”状告天津某肿瘤医院获赔人民币95000元，这也是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反对就医歧视而提起首例法律诉讼案⁵。此案中，这名艾滋病患者因HIV检测报告被涉事肿瘤医院推诿、不予进行肿瘤手术。

此外，“艾滋病儿童特殊学校”这种机构的存在也足以说明，艾滋病在当下的社会仍然因其传播方式被“特殊对待”，艾滋病患者往往被认为是“性放荡的”、“与毒品有关的”等，遭受种种歧视。在如今艾滋病患者在药物干预下基本能够正常生活的治疗技术（据2011年的报道，70%的艾滋病患者都可以正常工作）下⁶，歧视却往往导致大家对艾滋病避之不提，

³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⁴ 同上

⁵ 《国内首例艾滋病人反歧视案胜诉》，〈<http://www.100xhs.com/news/shxw/24910.html>〉

⁶ 《艾滋病：不再致死，却依遭歧视》，Christian Raaflaub，〈<https://www.swissinfo.ch/chi>〉

再加之“性”这一话题在中国文化中长期的避讳性，导致人们关于防艾、治艾的常识严重不足，反而不利于艾滋病的预防和艾滋病患者及时、正确地接受治疗。在艾滋病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像作者苏珊估计的那样乐观——即使艾滋病不再成为严重的死亡威胁，它被附加的隐喻、给患者带来的歧视和心理痛苦仍然还未消失。



(图：艾滋病反歧视的宣传海报和相关活动)

当然，艾滋病只是“隐喻带来歧视”的典型代表之一。再如，主流审美带来的人们对女性“瘦弱”美的欣赏，导致社会心理对厌食症和肥胖症不一样的态度等。

更进一步说，正如苏珊书中所写，疾病的隐喻反映的是我们“文化的巨大缺陷”、“对死亡的阴郁态度”、“有关情感的焦虑”等。这些问题一个尤为明显的体现就是我国主流文化对性和死亡的态度。社会对于梅毒、艾滋病等性病的隐喻和歧视，反映了中国文化中“性文化”的缺陷——“性”长期被避而不谈、被“羞于谈论”，甚至正常的性在有时也被认为是“肮脏的”，这自然就带来一系列包括对性病患者的歧视在内的社会文化问题。

而“对死亡的阴郁态度”亦有类似体现。和性话题一样，死亡也被认为是“不祥的”、“讳于提及的”。正如白岩松所说：“平常生活中没有人谈论死亡，我们假装不知道有死亡这回事，仿佛不存在一样。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有意识地阴暗化、边缘化了整个身后事。”⁷这样的避讳态度导致很多儿童甚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能正确认识和看待“死亡”。**性教育和死亡教育正是我们社会主流文化和教育中最常忽略、不加重视同时又极为重要、迫在眉睫的两个部分。**这是我通过对“疾病的隐喻”背后延伸出来的一点思考。

⁷ 白岩松：《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知识分子，2016-6-17